



□ 哈斯巴根 杨昊霖

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各民族“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强调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

《江格尔》是蒙古族民间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其艺术成就可与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以及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相媲美，一同成为世界古典文学史上璀璨的珍珠。

史诗的戏剧张力

《江格尔》主要讲述以江格尔为首的12位英雄率领6000余名勇士，抗击敌人入侵，降妖除魔，收服众多部落，建立理想家园“宝木巴”的故事。数百年以来，《江格尔》史诗一直以口耳相授的形式在我国新疆的卫拉特蒙古族中流传，并演变成戏剧、民歌等多种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活动。《江格尔》迄今共有60多部，内容长达10万余行，是蒙古族英雄史诗中章节最多、篇幅最长、艺术技巧最为精妙的作品。

《江格尔》最初产生于阿尔泰山与额尔齐斯河一带，17世纪随着卫拉特蒙古各部的迁徙，逐渐流传至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19世纪初，德国学者贝格曼最早记录并翻译俄国卡尔梅克人传唱的《江格尔》。后来，俄国学者陆续用俄文、托忒文刊布了《江格尔》的部分章节，进行较为系统地整理研究。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对《江格尔》作出初步评价和注释。至90年代中期，我国史诗学界已涌现出诸如仁钦道尔吉、贾木查、巴图那生等一批研究《江格尔》的专家，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江格尔学”的发展。如今，《江格尔》宝贵的文艺价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青睐，“江格尔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很多国家都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江格尔》的故事情节复杂，塑造的艺术形象众多，人物性格特征丰富，可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将他们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正面人物中主要有12位英雄，他们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江格尔是整部史诗的主人公，所有的情节、人物均围绕着他而展开。自江格尔3岁起，就开始建立丰功伟绩，降伏了凶恶的魔王；7岁时，挫败了7个敌国，成为宝木巴的英明首领。江格尔的军师阿拉坦策吉智慧过人，具有预测未来的能力。洪古尔勇猛果敢，有着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是宝木巴左翼第一勇士。萨布力大大

何易于，唐末庐江（今安徽合肥庐江县）人，唐文宗太和年间任益昌（今四川广元昭化区）县令。他在益昌为官三年，以民为本，勤政爱民，使益昌“狱无系民，民不知役”，百姓实现了安居乐业。由于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新唐书》把仅是县令的何易于收入“循吏列传”，其中“何易于挽舟”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

何易于在益昌上任不久，一次，他的上级利州刺史崔朴乘着春光明媚，带了许多宾客泛舟春游。到益昌附近，需要民夫拉纤。何易于就把笏板插在腰间，去江边拉纤挽舟。崔朴看到后很吃惊，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何易于说，现在正是春天，百姓不是忙于春耕，就是在喂养春蚕，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自己作为利州主管下的县令，暂时有空闲时间，正好可以充当这个差使。崔朴听了很是惭愧，便停止了春游，和宾客上岸匆匆离去。作为一位地方官，在百姓辛勤劳作之时，面对上级的无理摊派，何易

无穷，手持神斧，在战役中屡建奇功。萨纳拉脾气暴躁，但为人忠诚老实，注重义气，曾多次拯救宝木巴于水火之中。明彦是天下无双的美男子，精通器乐演奏，主管礼宾和外交事务。赫吉拉干能言善辩，掌握多种民族语言，是宝木巴的大断事官。《江格尔》中的反面人物有凶恶的暴君以及各种妖魔鬼怪、毒蛇猛兽，他们法力强大，时刻觊觎富饶的宝木巴，是江格尔和众勇士们的斗争对象。

这部史诗的叙事结构亦颇为独特，数十章作品独立成篇，互不连贯，各有各的主角和完整故事，其中最主要的故事类型有结义故事、婚姻故事和征战故事。结义故事讲述英雄们经过战场上的交锋，最终结为兄弟的事迹。婚姻故事诉说江格尔和众英雄在娶亲过程中的各种经历。征战故事赞颂江格尔和众英雄们战胜侵略者，保家卫国的伟业。《江格尔》的总体结构是在情节上独立的200多部长诗的并列复合体，因此学界又称其为“并列复合型英雄史诗”。

《江格尔》作为一部口传史诗，通过史诗歌手的演唱和教授，才能历久弥新、传承至今。蒙古族把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称作江格尔奇，对他们极为敬重。从古至今，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江格尔奇，他们为这部史诗的流传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意涵丰富的人文价值

《江格尔》继承我国北方悠久的史诗传统，凝聚着独特的语言、艺术、风俗等元素，蕴含着深刻的精神内涵与显著的人文价值，涉及历史文化、艺术审美以及习俗制度等多个方面。

《江格尔》的部分故事情节反映了我北方游牧民族早期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例如，在江格尔的故乡宝木巴，军政组织形式分为左右两翼，江格尔大汗居中统治，大汗下设左翼将相和右翼将相管理军政事务。这是古代游牧民族常用的一种军政制度，即左右翼制度：首领居中统治，左右翼长官在两侧拱卫。早在匈奴时期就存在类似的两翼制度，并为后世的游牧民族所沿袭。

《江格尔》各章基本以众英雄聚会议事开篇，江格尔大汗坐在有44条腿的巍峨宝座上，将士们在其附近围成7个圆圈。会上由江格尔或其他英雄提出某件重大事情，然后众人互相讨论，各抒己见，最终由江格尔做出决定。从中可以看到蒙古族早期部落联盟议事会的画面，元朝时期将这种制度称为“忽里台”，意为“大朝会”，是聚集诸

王、贵族的军政议会，用于推举首领、决定军事行动等。

在宝木巴生活的数百万民众是首领的属人，与其领主有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属人需要向大汗和勇士们缴纳马匹、牛羊、乳制品以及其他财物，在战时服役出征。他们当中有各类工匠，负责制造生活用品与武器装备。史诗中对宝木巴社会的描述并非无稽之言，而是源自《江格尔》形成时期蒙古族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反映的是四卫拉特联盟时期的社会结构。

《江格尔》不仅承载了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记忆，其艺术成就也达到了民间诗歌创作的高峰。它使用丰富优美的卫拉特蒙古族口语，融合穿插古代民歌、祝颂词、谚语等传统民间文艺形式，巧妙地运用铺陈、夸张、比喻、拟人、押韵等修辞手法，使整部作品呈现出雄浑瑰丽、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宝木巴的英雄们常常这样赞美洪古尔：“是飞翔在晴空中的雄鹰，是阿尔泰山里的金色天柱，是刺杀敌人的长枪，是扑向羊群的灰狼。当我贫穷的时候，洪古尔是我的牲畜。当我孤独的时候，洪古尔是我的伴侣。战斗的时候，洪古尔是我的钢鞭。说话的时候，洪古尔是我的口舌。”类似比喻、想象等手法的运用，让史诗的语言效果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无处不体现着蒙古族独特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意象。

演唱《江格尔》是一门综合性的表演艺术，民间艺人倾注了全身心的热情与才华。他们不仅将《江格尔》中的每一段唱词、每一个唱腔都打磨得精准到位，更巧妙地表情与动作融入其中，同时伴着“托布秀尔”乐器的独特音色，为这些故事增添古朴的韵味。如此一来，江格尔奇将《江格尔》中曼妙抒怀的诗句与扣人心弦的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达到高超的艺术成就。

超越民族、阶级界限的理想乐土

《江格尔》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杰作，它深切寄托了割据时期蒙古族民众内心深处对和平、富足生活的期盼，热情讴歌那些为保卫家园而奋勇斗争的英雄人物，这种向往追求与史诗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江格尔》的形成时期，蒙古族社会深陷割据的泥沼之中。四卫拉特联盟走向分裂，内部互相攻伐，外部敌对势力不时侵扰，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连绵的战争给卫拉特地区的民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与痛苦。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民众心中充满了不满与厌恶。他们痛恨割据和掠夺战争带来的苦难，渴望一个安定、和

平、统一的未来，并怀念那些具有家国情怀的英雄人物，因此史诗中的传奇人物便成为他们心中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史诗中描绘了一个与当时黑暗的社会截然相反的理想乐土——宝木巴。在这里，人们享受着永恒的青春，永远保持着25岁的容颜；社会和谐安宁，没有骚乱；家庭幸福美满，丰衣足食。宝木巴的气候宜人，没有酷暑，金秋绵延。大家共同追求和平与幸福，彼此关爱，相互扶持。他们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宝木巴不仅是蒙古族民众内心深处的向往，更是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共同追求。

宝木巴英雄们的心中燃烧着对家国的深情大爱，肩负着守护故乡的神圣使命，展现出无比坚定的责任感。在敌人侵犯自己家园时，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共同的誓言：“虽然有众多的敌人聚集侵犯，我们也无人后退，只是勇往直前。虽然有崇山峻岭，我们的坐骑没有不能攀登的顶峰。不怕那咆哮的大海，波涛猛卷。不怕那熊熊的火海，烈火燎原。”当残暴的芒乃汗派遣使者向江格尔提出5项屈辱条件时，勇士洪古尔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视死如归，说出“我纵然粉身碎骨，不过是白骨一堆，鲜血一碗”的豪言壮语。史诗中对勇士们保家卫国的决心进行细致刻画，不仅充分彰显了他们的英雄主义气概，更是在其中注入了激昂的乐观主义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江格尔》中对于宝木巴家园的理想化描写，超越了民族、阶级的界限。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数百万不同民族的居民，他们使用着70种语言，彼此间和睦共处，不分你我。这一理想深刻地揭示了这部作品的核心主题，它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也是《江格尔》能够亘古流传、不朽于世的关键所在。

《江格尔》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虽然历经数百年的传唱和演变，至今却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生动体现。同时，《江格尔》作为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与保护对于推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中第一次提出了“循吏”之称，他心目中的循吏，主要是指能“奉法循理”者。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认为循吏是促成“法平政成”的有为官吏。作为官员群体中的一种类型，尽管循吏对地方的治理无论是在内容、方式上，还是在取得的成绩方面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大都秉持着执政为民理念，一般表现在勤政爱民、清正廉洁、重视教化、秉公执法，并能以身作则。也许他们在治理地方上所取得的一些具体成绩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他们尽心尽力为百姓谋福祉，一心一意造福一方，因此，他们赢得了地方百姓的普遍尊敬和爱戴，为后世树立了一种品德和政绩都很优良的官员典范，一种用以评判官员的善恶、功过与是非的价值标准。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其中农业文明是主干。中国农业起源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在距今七八千年时，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成为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

《王祯农书》里讲，“器非田不作，田非器不成”，不断发展演变的农业生产工具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犁是古代中国最重要、最典型的农具之一，中国犁的发明领先世界2300年左右，它所带来的变革，使中国农业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犁的前身——“耒”与“耜”

在铁器时代到来以前，“耒”与“耜”一直是我国主要的耕地挖土工具，是从原始社会中期到商周时期主要的农耕工具。耒的下端是尖锥式，耜的下端为平叶式。耒是从采集经济时期挖掘植物的尖木棍发展而来。单尖木耒的刃部发展成为扁平的踏足板状刃，就成为木耜，于是破土阻力大为减小，还可以连续推进。它们的发明使种植由穴播变为条播，谷物产量大大增加。早期的耒耜都是木质的，《周易·系辞》说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因此不容易保存下来。不过，在陕西临潼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过使用双齿耒挖土留下的痕迹。后来，人们又逐步将木耜改成石质或骨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等地出土了很多石耜，其年代最早可达八千年前。进入铁器时代以后，耒耜被普遍安上铁质的刀套，刃部加宽，耒耜能踏足之用，原来踏足横木取消，耒耜就发展为“耨”，这就是直到现在还在使用的铁锹的雏形。而把耒耜上下运动的启土方式改变为前曳后推水平运动的启土方式，耒耜就逐步发展为铁犁。到了汉代，铁犁已经普及，但耒耜仍然没有绝迹，不但文献上经常提到，各地汉墓中也常有耒耜的模型或实物出土。大约到三国以后，耒耜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于铁犁是从耒耜发展而来的，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沿袭着旧名，如唐代陆龟蒙写的《耒耜经》，实际上就是讲耕犁的。

金属犁的出现

犁铧是耕地时安装在犁上用来破土的金属片，商代开始出现金属犁铧——青铜犁铧。江西省新干县殷商墓出土过两件青铜犁铧，呈三角形，上面铸有纹饰，这是目前仅有的两件经过科学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和年代判断的商代铜犁铧，它证明商代确实使用过铜犁。虽然没有犁架出土，但从铜犁铧的形制观察，已和后来的铁犁铧相类似，为以后铁犁的使用开辟了道路，因而在中国农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商周时期，青铜被人们视为珍品，也决定了青铜不能完全代替非金属农具而一统天下。正如恩格斯所说：“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正因为如此，商周时期，我国青铜农具的使用并不很广泛。

铁犁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已掌握生产可锻铸铁和块炼渗碳钢的技术，比世界上的同类发明领先2000多年。铸铁，尤其是增强了强度和韧性的可锻铸铁的出现，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使生铁广泛用作生产工具成为可能，大大增强了铁器的使用寿命。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开始推广，铁犁铧也取代了青铜犁铧。战国中期，铁农具已在黄河中下游普及开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都有战国的铁犁铧出土，说明犁铧已在中原地区广泛使用。至此，金属耕具代替木石耕具的过程终于完成。现在出土的铁犁多数是“v”字形锋冠，宽度在20厘米以上，比商代青铜犁大得多。它是套在犁铧前端使用的，以便磨损后及时更换，减少损失。恩格斯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铁犁的出现及牛耕技术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力、扩大了生产规模，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铁制农具与牛耕技术的使用，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的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犁的发展与演进

汉唐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度出现太平盛世景象。《盐铁论·水旱》中说：“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这充分说明了铁制农具的优越性。汉唐两朝鼓励人民发展农业及手工业，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革，出现了很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具。汉代铁犁的结构与零件已经基本定型，具备犁架、犁头 and 犁轅，用牛牵引。汉武帝时期，中国开始广泛使用世界上最早的曲面犁壁，与犁铧后部共同组成一个不连续曲面。曲面犁壁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整地质



□ 郝良华

量，使耕犁不仅能松土，而且能翻土、成垄、除草、灭虫，从而改善了土壤中气、水、肥状况，便于作物生长。直到18世纪初，曲面铁犁壁传入欧洲。

唐代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最早出现于唐代后期的东江地区，它的出现是我国耕作农具成熟的标志。汉代的犁是长直辕犁，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尤其不适合南方水田使用。直到唐代出现了长曲辕犁，才克服了汉犁的弊端。与直辕犁相比，曲辕犁的设计具有良好的使用功能，不仅可以通过扶犁人用力的大小控制耕地的深浅，又符合人机工程学要求，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具有很高的劳动效率。比如：犁架加大显得更加稳定，便于在耕地时控制。曲辕犁的犁盘上可以架两头或更多牛，这样既保护了牛，又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耒耜经》对各种零部件的形状、大小、尺寸有详细描述，十分便于仿制和流传。从技术上看，唐代曲辕犁的设计更加先进，功能相当完善，使用性更强，领先欧洲近两千年，是当时人类最先进的耕地农具。此外，唐代曲辕犁不仅有精巧的设计、精湛的技术，并且还符合均衡与稳定的美学规律。造型以直线型为主，硬朗稳定，而犁轅和犁梢的曲线优美，比例合适，造型富有变化，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唐代曲辕犁的发明，掀开了中国传统农具史新的一页，标志着中国耕犁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此后，曲辕犁就成为中国耕犁的主流型犁。

几千年来，勤劳勇敢、富于智慧和创造力的中国古代先民在进行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活质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推动了社会的文明进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工具是社会发展与生产生产的尺度”，高度评价了农业生产工具的巨大作用。从犁的原型——原始农具耒耜到商代出现的青铜犁，尤其是到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冶铁业兴起，铁犁问世，是农业生产工具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在人类农具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哪一种农具像犁一样，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汉唐时期的铁犁传入亚洲各国，17世纪传入欧洲地区。欧洲使用铁犁比中国晚了2300年左右，然而却引发了欧洲的农业革命。可以说铁犁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铁犁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奉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重要体现。正如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评价：“铁犁的发明是人类农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里程碑。”

